

闽西畬族源流初探

郭启熹

(闽西职业大学 福建龙岩 364021)

摘要 畬族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它的历史是靠代代言传和口授的。文中根据作者的田野调查、有关历史文献与当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论述了闽西畬族发展的源流,探究畬族在闽西的形成及其迁徙流变,以及畬族在闽西历史的重要地位,闽西汉畬的互动发展与融合等问题。

关键词 畬族 闽西 源流 汉畬的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8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97(2002)02-0014-04

闽西自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汀州建置之始,就包括长汀、黄连、新罗三个县分,到唐天宝元年(742年)新罗县改称龙岩县,并于陈元光建漳州的大历十二年(777年)改隶漳州,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县为州不变;黄连县也在天宝元年改称宁化县仍属汀州管辖。因此闽西地域自唐至清代在包括汀州、龙岩州属地中,是包括宁化、清流、归化三县。解放初,清流、归化两县除设置永安专区时暂属之外,三县也归属汀州或龙岩专区所辖,直至1961年才划归为三明专区。因此,历史上的闽西向来包括现有龙岩市七个县市以及宁化、清流、归化在内共十个县市。

畬族之称始于南宋刘克庄,他在《后村先生大全集·漳州谕畬》中称:“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蛋,在漳曰畬。……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而作为畬族的族称的定名则是1956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两度到闽、浙等地识别调查后,经本民族协商后确认的。闽西上杭畬族是福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87年底发文同意,龙岩地区行署审定的。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闽西畬族513人,主要指漳平山羊隔畬族乡人口。1982年确认长汀馆前黄湖为畬族村。1987年上杭县庐丰、官庄被确认为畬族乡。1992年统计全县包括散居各乡、镇畬族总人口有33978人。1990年漳平象湖龙门、溪南吴祠、双洋尾村、新桥大罗山、小罗山、灵地乡长安等6地被确认为畬族村民小组。这样整个闽西畬族人口总数近三万五千人,约占全国畬族总人口的5.5%。

一、闽西畬族源自古越族

历史是发展的,民族概念也是动态的。畬族人对畬族称的认可有它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的一般过程。”[1]古越族是我国东南部原始先民的后裔,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以及良渚文化均证明了这点。它本属滨海文化群的。汉初,由于越族助刘汉平楚有功而分封于东瓯、闽越和南海。其中南海王织即封于闽西。《汉书·高帝纪》记载:“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南海王封地在什么地方呢?清乾隆间全

祖望《鮑埼亭集·经史问答》中认为应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后来汀州人杨澜在《临汀汇考》有这么一段话:“今武平本长汀也。唐置州后,以本州西南境的南安、武平二镇,观其命名之意,因南武二字分析并举,当时因其地为汉南武侯织所封也。宋升镇为县,乃专武平之名,而其地正在汀、潮、赣之间,全氏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之说,此其是也。”可见南海王国的政治中心就在武平县。

今人潘蔚、朱维干、蒋炳剑等均持此说。蒋炳剑称:“从史书记载,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是畬族历史上的聚居地。因此,畬族的先民与古越族中南武织这一支越人的关系最为密切。”[2]《汉书·严助传》记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文帝:“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其后汉武帝时又迁越民于江淮间,南越王族北迁至江西上淦,乃至江淮,其民不愿北迁者则隐没闽西深山密林,靠山耕为活,居无定所,以刀耕火种为生产方式。这样这支古越族由滨海文化群落转化为游耕文化群落。他们入三国时的吴之后被称为山越,唐宋间被称为蛮獠,南宋末年即到刘克庄以后才被称为畬民。因此把闽西畬族先祖说成是武陵蛮南下广东后迁入闽西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有关这一畬族在闽西的形成过程,也有一些历史文献和学术界研究成果。

关于始名于三国时的山越,《三国志》的陆逊传、贺全传、孙权传、孙皓传、诸葛恪传等均有记载,林惠祥称:“盖越本大族,故号百越,山越盖即古越族之遗民。西汉时建国瓯越,闽越之开化的越人虽被迁徙江淮,然其伏匿山谷者必甚多,以其山人口不易计数,然诸葛恪在丹阳募其人为兵便至四万人,此四万人皆系壮丁,且祇丹阳一隅,其全人口必甚多。”[3]至今漳平山羊隔畬民仍自称为山越,正是源于三国时代。林惠祥又称“三国之后至于唐代尚有山越,其同化时间如此之久,更可证其族之大与族性之强。”[4]

唐初陈政,陈元光入闽驻兵于漳泉,《乾溪县志》载:“六朝至唐,漳江以西及南北一片之地,皆群苗窟穴”。苗即为蛮,《福建通志》更为明确记述“六朝以来,戍闽屯兵于龙溪,阻江

为界,插柳为营,两岸尽属蛮獠”。当时蛮獠声势甚为浩大,陈元光于永淳二年(683年)给唐皇奏章《请建州县表》称之为“所事者蒐狩为生,所习者横暴为尚,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履徙。”垂拱四年(688年)在《谢准请表》又说:“治理诚难,抚绥未易”。陈元光经过几十年征战,最后竟然被畚军首领兰奉高“刃伤而卒”。传说当时唐朝官军曾攻至汀州城,兰奉高仍牢牢守住汀州城[5]。

唐末王绪率军入闽,取道于汀州,汀州刺史钟全慕投降,而大批畚族先民给予强烈反抗,《资治通鉴》卷259《唐纪》称乾宁元年(894年)宁化“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同光二年(925年)12月又有汀州民陈本起义,率领三万人围汀州。表明了闽西土著“蛮獠”力量相当强大。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1:“潮与漳、汀接壤,盐寇、羗(畚)民群聚……”。

《续资治通鉴》卷183卷《纪一》:“宋张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时汀漳诸路剧盗陈吊眼及畚妇许夫人所统诸畚军皆会”。许夫人所率畚军号称10万参加抗元斗争。

《元史》卷10《世祖本纪七》:“(至元15年即公元1278年)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苍括及畚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1279年5月)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畚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如故”。

元《一统志》卷8:“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舟车不通,商旅罕至……山深林密,四境推排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畚民”。

《明史》卷45《地理志六》:“漳平……东南有象湖山,南有百家畚洞,踞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交”。

杨澜《临汀汇考》卷3《风俗考畚民附》:“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畚客。……畚字不见于史,各省诸苗……皆无称畚者。《明史·地理志》中,……闽地之蛮皆称曰畚也”。

1940年邓光瀛《汀县志》卷35《杂录畚客》载清范绍质《瑶民纪略》:“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行为篱,伐荻为户牖,临清溪栖茂树,阴翳翳窅然深曲。其男子不巾帽,短衫阔袖,椎髻跣足,黎面青睛,长身猿臂,声哑如鸟,人呼其名畚客”。“以盘、蓝、筭(即雷)为姓,三族自相配偶,种山为业,精射猎”。

1945年郑丰稔《龙岩县志》卷29《杂录》:“畚客即瑶人,岩属俱呼为畚客。《桂海虞衡志》瑶本盘瓠之后,范晔《后汉书》:盘瓠帝尝之畜狗,负少女入南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性鸷悍,言语侏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盖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处,间有之,在岩者惟蓝雷二姓,在平宁者,有蓝、雷、钟三姓。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

所有这些记载说明畚族是闽西的土著,它的先民是山越,隋唐间汉人则称之为蛮獠。他们当时是闽西的主族。畚民或归附汉族或外迁他乡,人口迅速减少是元代以后发生的。

二、畚族谱志记述其先祖曾是闽西主族

这里我们再从闽西畚族的族谱记载中也可以窥见闽西畚族本是闽西当地的土著主族。闽西现有畚族以钟、兰居多,

雷姓很少,盘姓则仅见于广东增城。

《赣川郡上杭钟氏族谱》(新编本)钟有煌序言(一)称:“谱载贤公及妣马氏从古虔州(即赣州)迁至闽中鄞江(即汀州府)的白虎村定居创业。至汀州设府治时(即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6年)已达三十九代”。谱文还记:“第三十世鄞江始祖贤公,字嘉彦,妣马氏、黄氏,生朝。……根据《久泰宗谱》载:自贤公来至汀州,到礼公时已住有三十九代。初唐开福抚山洞于鄞江,置汀州。”

钟氏《久泰宗谱》旧序称:“盖祖公始焉居住在河南汴州府京县……汉光武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甲寅五月三十日辰时将家眷迁彼异邦,过江避难,行至虔州府居住,安家乐业,因于僻处,不堪安业,移寓福建汀州府白虎村。时至礼公时,钟家迁来汀州住有三十九代,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因朝廷圣旨,欲造迁府场,要我九龙岗马氏祖婆坟地辟为汀州府衙,要将白虎村定居地辟为县衙,礼公无奈,遂将三千六百贯文粮田舍入开元寺去乞,上司将射箭坝官地二百贯文田扒换祖堂房屋地基,祖公遂移徙至南岭岼岼坑,而恭、宽、廉、敏、惠、节遂迁江、广等处。”同谱《钟氏源流序》记有:“王治国安民亲自出免三千七百户口不纳粮税是实,应高辛帝王千万载,公主配亲共生三男一女:盘、兰、雷、钟自安,代代不纳粮税,不与庶民交替无占庶民田土……。”

从谱叙可见:第一,钟姓是闽西现有地方志、谱史料记述中最早从中原南迁来的居民,从汉光武建武三十年迁入闽西,至今已近两千年。第二,钟姓本为汉族即商汤后裔,传至三十二世宋康王偃的三弟烈公受封钟城,以地为氏,故烈公为钟姓始祖。为什么到了闽西又成了崇祀盘瓠成为畚族先民呢?这只能说明是钟姓汉人南迁入闽西后,隐没山林的山越攀附其姓而成的,这正是汉越融合的例证。第三,钟礼在汀州白虎村的坟地与宅基被占领,表明后来陆续迁来汉人对土著的统治以及闽西土著势力的退却。第四,《久泰宗谱》的《源流序》中称“三姓是与民居,会三千七百户口不纳粮税”与《元和郡县志》所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福建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相合。记叙了汀州建置前“不役”“不税”的现实。

《闽杭卢丰兰氏族谱》其附叙《兰氏历代迁居始末》称其祖上由炎帝的十世孙榆罔赐子昌奇以贡兰授姓,封地汝南,后于河南、山东、北京、山西、陕西诸地迁徙繁衍。108世兰明德与“宦游金陵卜建康家焉”,被归为南迁始祖。二世(109世)兰采和为开元元年(714年)进士,后隐于终南山为八仙之一。十五世吉甫公“乃时遭胡乱不已,弃家入闽,至福清县五福乡开基,兰氏居闽蕃衍之盛,实奉公为鼻祖云,公终于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十七世祖万一郎公字钜夫,因贾似道把持朝纲,“公虑祸及,迁汀州宁化石壁为汀郡开基始祖,终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十八世熙三郎入杭开基。在这部族谱中始终回避盘瓠信仰的事实,这正如重修兰氏石椅“种玉堂”谱序所述:“在族谱中不愿直接承认,是出于当时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社会背景,兰氏族人为了避祸和不受歧视,不得不设法掩饰自己是‘盘瓠’后裔的身份”。该谱所记谱系则与漳浦赤岭兰氏族谱所记相同。因此《闽杭卢丰兰氏族谱》所记的族源与唐初即已活跃于九龙江、汀江一带并与陈

政、陈元光周旋了几十年的畬族首领兰奉高等史实不相符合,这同样是为了掩饰畬人士著为“蛮僚”后裔的史实。笔者认为庐丰谱所记以汝南为郡望以及初 108 世兰明德等,南迁均有具体的年代、社会背景、职业、官爵、迁居原因等,应属可信。但这仅是几十万兰姓族群中的一支,而当时畬族先民则攀附于这支兰姓望族。当然,是否如此尚待考证。

上杭《雷氏聚福堂族谱》在《始祖焕公世传》中记:“始祖焕公,字孔章,晋武帝时文武两榜进士……肇基于饶州府鄱阳东北小雷岗”“第二世忠公,焕公五子,任福建汀州司马,莅任有年,遂定宅于汀州上杭东门瓦子街立业”。“第三世叶公之子昭公,名昭贤,晋武帝时钦点翰林院任延平府正堂”。“第四世昭公长子日斌,字盛魁,赐进士任闽中龙岩县正堂……墓葬明正德元年丙寅五月十八日重修碑记。”“第十世世宗次子代达,字声远。博学经史,徙居福建宁化,又徙汀州府,妣连氏,夫妇合葬汀州东门城内”。“十九世恭彦长子宽仁,名承先,官拜尚书左射郎,移居汀州宁化妣夏侯,继罗氏,夫妇生歿失考,同葬宁化流竹坑人形。”以上所记晋武帝时 265 年—290 年),正值始置苦草镇之始(282 年),十九世移居宁化已入中唐。说明雷氏晋以前是从饶州迁来汀州的,二世雷忠任汀州司马,为武职。四世雷日斌任龙岩县正堂,属后世著谱时的补叙,因为龙岩县县名始于唐天宝元年(742 年),苦草镇则建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 年),因此雷日斌可能是苦草镇的首任行政长官。总之雷姓也是从江西南迁入闽西的望族,而且成了主管闽西的主族。这样,闽西当时土著蛮僚攀附为姓也在情理之中。

三、闽西畬族人口急遽减少的原因分析

唐宋以后,闽西畬族先民为什么会由聚居的主族变成成为大分散小聚居的被统治的小族呢?尤其元代以后畬族为什么会人口大量地减少呢?

(一) 汉人入迁置州设县,与战乱畬人外迁。汉人南迁入居闽西的高潮在唐以后有三次;第一次是唐初的陈元光开漳,陈政率府兵 3600 名,后来又增援兵,总数达六七千官兵,还不包括举家随军的眷属。而据新编《漳州市志》卷 3 人口志称当时垂拱二年(686 年)全州仅 1690 户,《旧唐书》记天宝十年漳州辖漳浦、龙溪二县也才 5346 户,17490 人。而闽西在唐天宝元年(742 年)临汀郡所辖长汀、龙岩、宁化则只有 4682 户,15720 人。陈元光入漳后周边建了四个行台,苦草镇是行台之一,派有大量驻兵,自己也经常到闽西巡狩征战,他的后代也落籍在龙岩。经过陈元光几十年的开拓,使得“北至泉州、兴化,南逾潮州、惠州,西抵汀州、赣州,东接沿海各岛屿,方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6]。第二次移入闽西高潮是王潮王审知率光州人民入闽,当时中原正值黄巢起义后,烽火不息,加以有同属光州的陈政陈元光入闽在前,因此入闽路线明确,光启元年(885 年)正月《新五代史》卷 68《闽世家第八》称“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此部初由王绪率领军纪很差,一路剽掠,这也是引起后来的汀州洞蛮反抗的重要原因。同年八月王绪被王潮囚禁自杀后整饬军纪,一路才秋毫无犯。在数万兵众中也有部分落籍闽西,如陈、姜、徐、翁、范、邹等姓,其后裔均留居龙岩,明代何乔远《闽书》卷 28《汀域志》记有:“邹,名馨,固始人,从王审知入闽,平

汀寇,镇雁石有功。”杨澜《临汀汇考》也记:“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龙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于是负耜者皆望九龙山而来。”因此汀州人口到了北宋中叶元丰年间达 81454 户,其中迁入客户 15297 户,漳州达 100469 户,其中迁入客户 64549 户,龙岩县约占其 1/4)。第三次汉人入迁闽西的高潮是宋末文天祥抗元斗争之后,文天祥领导抗元斗争,针对蒙古贵族对“汉人”“南人”的歧视,团结少数民族,即“并结溪峒蛮”,畬军首领陈吊眼、许夫人在闽西南聚十万抗元大军,后来遭元军镇压失败,元军每攻下一城,即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斩杀屠城。因此入元之后,闽西南人口锐减,据《阮史·地理志》元至顺元年(1330 年)汀州路只有 41,423 户,238,127 人,比之宋宝祐年间(1253—1258 年)汀州有 223,432 户,534,890 丁(6 岁以上为男丁,换算成总人口约在百万以上)漳州路只 21,695 户,101,306 万人,而淳祐年间(1241—1252 年)漳州有 112,014 户,160,566 丁,人口减少幅度如此之大,当然也包括着畬族人口的急剧减少。因此入元以后大批汉人迁入闽西,就我们目前所见闽西各谱志,汉族大部分姓氏均属元代以后迁入。其中闽中多迁入龙岩,江西客家多迁入汀州。

由于汉人大量入迁,占据了闽西的生存空间,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力低下的畬人元明以后便不得不举族外迁。我们从现有畬族谱志中可以找到一些史据,他们迁至广东、江西、浙江、闽东各地,其中以闽东最多。

根据潮安凤凰山区的碗窑、石古坪、李工坑等村畬民回忆,认为他们是福建汀州迁来的,而且再没有其他地区迁入的说法。李工坑村雷姓畬族更明确记载是明万历十三年(1588 年)由福建省汀州龙岩县迁居于此,至今四百余年。[7]

浙江不少畬族人传为明代从汀州迁去的。江西贵溪的畬族是明代中叶从闽西迁去的[8]。

闽北政和《钟氏家谱》称:“我氏自汀州来,世居凤凰山。”

闽东畬族人口多,迁入的路线也较为复杂,根据不少畬族族谱记载:“唐光启二年(886 年),盘、蓝、雷、钟、李三百六十个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至连江马盘登岸,时徙罗源,大垵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新唐书·王潮传》记,王潮是取道汀州、漳州、泉州的,替王潮当向导者也必有闽西的畬人进入闽东的,如:钟氏族谱则明确记载,最早迁入的畬族是唐五代钟彦江,从汀州上杭迁入福安韩阳坂五十二都钟莆坑,其后裔又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 年)再迁福安西郊大林村,这里便成了闽东钟姓的发祥地[9]。

从各个地姓氏族谱及有关调查,已发现从闽西直接迁入闽东的畬族支脉:兰姓有从上杭迁入 5 支,雷姓有从武平迁入 1 支,钟姓有从武平迁入 4 支,从上杭迁入 1 支。[10]

(二) 畬人隐称族称。统治阶级怀柔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使闽西千百年出现畬汉能够错杂共处的社会态势;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也使得大批畬族讳言自己的民族出身。早在唐初的陈元光遵循李世民宽缓的民族政策,提出“胡越百家,愈无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主张中华民族百家是一家,民族间应平等相待,招抚来降的畬族军,建立唐化里,分给土地,教给耕作技术,并且鼓励都下与畬民

通婚。这样一度极为强大的畬族反抗斗争力量终于被平抚下去。这种怀柔的融合政策被历代开明的统治阶级所沿用,所以才有刘克庄“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的记载,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仍循古例”。对山耕的畬民,“免差徭”。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全国畬族人聚居最多的福宁州官“立石勒碑,永禁各都保滥派畬民差徭”。乾隆年(1737)年重申“朝廷颁旨,绘画畬民图册进览。仍准畬民不编丁甲,免派差徭”。这样才可能使得畬族接受皇朝“恩抚”,漳平保留至今的畬族《雩皇歌》也就唱道:“自入潮州凤凰山,敕赐畬人不纳粮,四姓子孙龙犬祖,切莫作邪人笑闲”。才可能出现闽西千年以来畬汉杂居的社会态势。但是由于封建制度阶级矛盾斗争本质所决定,许多官僚、地主、官兵总是以畬族的善良、忍让为可欺,采取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如仅二百多人口的漳平山羊隔畬民反抗官府压迫,所在瑞都乡乡长陈贞南无力入山镇压,便用残酷的封锁政策,致使畬民在受封锁的一年八个月中(1938年3月至1939年11月)无盐无药,无所需生活用品,竟然病死33人,其中老人6人,儿童16人。畬人面对各种山税盘剥,匪祸横行,弄得畬人“怕派款,怕抓丁,怕土匪,怕官兵,怕逼租”,为了生存不得不隐瞒自己民族出身,讳称畬族人。这就是在畬汉错居地区中畬族人难以立身的重要原因。一些畬族聚居村落由于民族歧视,也是勉强地认可畬族血缘关系,无可奈何地保持着畬族的称号。如闽东《霞浦畬族志·迁徙肇衍》中所述,吴姓畬人始祖是乾隆初年从福安城关只身来霞浦盐田西胜南山避难,家妻被杀,娶畬族钟氏女为继室,原族不准其后裔认同为汉人,只好单独立谱为吴姓畬族,并繁衍至今。所以霞浦《祠源娘姓歌》就列举有盘、蓝、雷、钟、周、林、吴、干、刘、张、羊、王、宗、世、章、朱、爰、曹、方、康20姓为“祠源娘姓”。还有陈、杨、连、连、赖、魏、孔均有畬族人。就霞浦情况看,畬族是个包含许多姓氏人的大族群。闽西在畬汉错居的千百年来也必然是如此,具有畬族血缘关系的族群人是有很多,只是由于民族歧视无法认可而已。只有解放以后,共产党尊重和扶持少数民族的政策真正得到落实,恢复了畬族人的民族自尊,许多畬族才纷纷要求恢复自己的民族身份。

(三)畬人与汉族融为一体。政治经济的共生共存互动发展,促进了闽西畬汉民族相互摄取与融合。河老人、客家人从中原南迁进入闽西山区,固然带来先进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较为先进,但对山区的垦拓尚需作艰苦的摸索学习。畬族人在闽西山区本土开发,创造了闽西山区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山耕的生产经验,例如《长汀县志杂录》记述:畬客所树艺曰稜禾,实大且长,长汀客家人也就利用山坡地学习畬人种植这种畬禾,直至五十年代还有这一垦植耕作技术。又如解放前在深山老林里种植香菇,也是浙江南部的畬族人,他们每年冬天到龙岩、上杭一带的深林伐树,凿成木鳞孔,设法培养菌种,当地汉人是不懂这一技术的,他们秋来春去,种植大批这类野生的香菇。至于茶叶,蓝靛、苎麻、薏米……等的

种植畬人更是有许多独到的技术。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比较封闭的山区中,畬人无法形成本民族的市场经济中心,信息交流,技术传播,物资交流、文化教育往往都要依靠当地杂居的汉人。这样势必构成畬汉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尤其畬汉通婚后,进入闽西的中原汉人也必然渗透进畬族的血缘关系,可以说今天闽西土生土长的汉族不少人都会有畬族的血统。畬族人接受汉族的语言风俗,主要是共操客家话。而汉人也多少接受畬人风俗,如哭嫁抢婚,拾骨重葬,妇女放足等等。解放后为什么都是从客家人中恢复一些畬族的成分呢?这恰好证实历史上的畬人已在不同时期融入客家民系之中了。所以1993年编《长汀县志》卷35《风俗》称“千年来……不断渗透,吸收,溶化了闽越族,畬族的风俗,尤其是畬族原在长汀境内居住不少,至今以畬字为地名有二三十处之多。他们长期和客家相处交往,发展到通婚,彼此风俗互相影响。”

畬族过去是受压迫的,解放初漳平山羊隔畬族村在土改评成份时,没有一户中农,全属贫雇农。千百年来畬族人与汉族的穷人总是一起受穷,一起反抗,当农民揭竿而起时,他们是并肩战斗。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后,更是一起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仅上杭畬族付处(团)以上的老红军干部就有二十多位,牺牲革命烈士有四百多位,汉族的革命领导人不仅在闽西发动了土地革命,象邓子恢、叶飞、曾志等领导人还到闽东畬族聚居的农村去领导畬族共同投入革命斗争。同生死共患难血浓于水的阶级亲情,远远超过不同民族的民族感情,有些作为畬族革命领导同志也就不在意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这种思想对畬族民族的确认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总之,民族这一概念是动态的,汉族在历史上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融为汉族的在上古就有夏、夷、狄、戎、蛮五个部族,今天闽西畬族的认可也面临着这种历史性的民族抉择。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一卷34[M]. 北京: 北京世界出版社, 1954.
- [2] 蒋炳钊. 畬族史稿[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 [3][4] 林惠祥. 中国民族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9.
- [5] 施联朱, 宁晓. 畬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A]. 畬族历史与文化[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 [6] 沈定钧. 漳州府志卷24 宦绩一[M]. 光绪铅印版.
- [7] 朱洪, 马建钊. 广东省潮安县李工坑村畬族“招兵”节活动纪实[A]. 畬族历史与文化[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 [8] 施联朱. 畬族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0.
- [9] 福安坂中和庵(安). 钟氏族谱[M]. 清道光版. 1847.
- [10] 兰运全, 缪品权. 闽东畬族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章颖